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叙倫



我在六十岁以前

马叙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4823



954823

我在成都不過和劉開談了兩次，因為他患了嚴重的胃病才好起來，出來見我還要
人接著他走。因為我和他畢竟素昧平生，自然不敢一下子統統接洽。聽他的談話中還
露出許多考慮的意思。對他們這樣的談話，要了解他們的地位、環境、企圖，因勢利導
才會有效。這當然必須要日子長久，還得見面多。所以，我先把大力^和他^{本身}連成的利害
方面開說一下。但想把精力^他為下幫他的忙，當然我是不能做的，因為我的老父正在病中，所
以著重在他找一個幫助他的人。我就仍回北京。可是，我病了，在醫院裏由許德新告訴我，
中央方面有人^要幫我看病的時候是第二日的下午四時，為的是要我到西安去，和準時候著他
去，却沒有去。等遲了時，我出去看，到收校回說，要報告我。有一個人來看^你，也不留名片就
去了。石曉的坐客就是中共朋友。就在這幾天內，我收到我的老父病重的電報，急回杭州。
我才曉得我的老父因為受寒而得了肺炎，病勢是很危險的，但已好轉。可是，我遲遲
進飯。到了十二月十二日，父親和我都吃飯了，消息傳來，病勢在西安為^子張良
留位。十六晨，以許宮駒電報，叫我到南京，我曉得（它）為了西安事情開

系很大，要我去高應慶的办公室。我因为为叔已能吃半碗饭，暂时离开而
日，为石秀尔，便去为叔，并冒疾之初，当晚入京。到京后，方知朋友们仍
希往我处，因前介石秀尔固想进关西安，就在廿一日乘飞机入门。
廿二日和到湘的条谈，长谈良久。谈三日访问到湘，知道他已有回项王河
通电话去了。廿五日中午，即与石秀尔已故释放消息，那末，我就得什参
款，派再为川，万三，我们已把春涛介绍给到湘做顾问，郭春涛有电告他来的日子，
因此，等他到了，就和到湘一谈，把春涛留下，我就回北京。却又得了我为叔病危的电报，急
忙回校，这时已是二十六年的一月了，不幸的我竟在这月的二十六日，失去我慈爱的为叔。
(上面说的为叔，就是湖南常德人，四川的实族，因为本来有版时侯，在石秀尔统帅下，
在常德，住著，不体面，又因常德许多朋友，不便写出，现在只能不打算重版，但都有
闻我六十岁以前的一段故事，只敢改述一下。(一九五二—五三二记)

另外因有一册上或许也有补充的，可材料一下

放眼春如許卻堪憐
三分春色二分歸去
任道浮生能百歲
半已為虛度
算只為儒冠相誤
一晌胡塗何用說
要從今料理前頭路
無草草重新錯
情懷更與東風

作者五十初度之作

鮮有梅花山園水繞願為漁父
不學磻谿垂釣者只釣旂常鐘
鼓得幾尾菱藕鯢鮒換取布衣
蔬食足便收綸買醉斜陽渡
人與我兩無忤 五十初度之作



又是十年去數十年韶華如故驕
絲非故舊地風濤淹綠野驚起魚
龍無數對錦陌銅駝不語破碎金
甌還待補愧深衣皂帽春申浦
空鍾阜空懷古捫天夢裏無憑

作者六十初度之作

豫且安排巖山之業日親蟬蠹生
畝梅邊一谿水此計因循已誤怕
斜照漸昏江樹扶竹間吟歸去
也又煙雲杳渺知何處浮一艇逐

鷗鷺

方寸初度之

作

馬

1521/02

中华民国前二十七年（前清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照新历推算的日子），我生在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一所朝西的、还是太平天国战争后仅留下来的古老宅子（太平天国时是一所当铺，铺名“元吉”）中。我的家庭历史是这样的：我家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胜武乡车家弄。高祖是一位农夫，名叫应凤。曾祖双名秀明，从绍兴到杭州，学做鞋子，是个工人，后来自己开起店来了，又是商人，才算入了杭州府仁和县籍。祖父呢，名文华，字焕卿，“三考出身”，正路功名，在前清做京官二十多年就过世了。我的父亲字献臣，名叫琛书；当然承继书香，但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

我五岁（实际不足四岁）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我的父亲在内客堂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靠外

一边缚上一幅红呢桌帷，桌子上摆了一副香炉烛台，为着给我“破蒙”，要拜孔夫子。给我破蒙的老师是头年（前清光绪十四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叫解元的山阴王会澧先生，这就可以晓得父亲对我的期望了。

王先生到了，簇新的礼服，映出他那样风神矍铄的仪貌。更从他的谈笑里，显着他的得意。因为他正要上北京去会试，似乎指顾间“连中三元”可以操券而得。

我的父亲自然也穿着礼服，先请王先生拜孔夫子，随后自己也拜，随后便叫我拜。我拜得真神气，王先生称赞了一番，父亲便向王先生行托付礼，彼此互拜了一回，随后父亲叫我拜老师。

破蒙开始了，撤了香炉烛台，摆上朱笔砚台。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官堆纸印得雪白，铺在桌子左边。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是四方的绸子，把三面向里摺起，再缝住了，便成了袋子，一面不摺的角上，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镶在上面，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大小和书包差不多，板的一面，四边刻着古式花样，无非“双鱼吉庆”、“笔锭如意”一类，中间直刻四个大字，如“福缘善庆”一类，这块木板的用意怎样？或者是古代

的“页”，为儿童学书用的（一般用的是板上用白缙粉漆着，可以写字）；或者不过为书包质软，借此衬得硬些，以便儿童装书。

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俨然人师地坐在上首，我就坐在左边。王先生指着《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海尔童蒙（这句或者有些错误，记不真了）。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叫我随他的声音念。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会念了。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

以后就是父亲教我了，当然继续读完这本《小学韵语》。读书以外，只有写描朱字。我一写就很合式，父亲更是欢喜。

可是我家的生活，要靠父亲每月薪水收入维持的，所以父亲也不能准时地继续教我。后来几年，父亲因为我的两位堂兄要读书，请了一位萧山某先生来家，我也跟着读“大学之道”了。后来又换了一位塘栖劳先生。后来请不起先生了，把我送到邻居一位张先生家。张先生有学生十几个人，聚在一间小屋子里，真是一阵一阵老鸦叫个不休，好在我也不过随口乱叫，张先生也不过只要学生背诵得出，就算了事。

在张先生家读书的那年，我已十岁了，可是我还不过读到下《孟》（《孟子》三卷，下《孟》就是下

卷)，而且也不晓得里面说些什么，但是我的写字算写得相当好了。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自然是旧历)下午，我的大祸临头了。这时我刚刚在那里叫：“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我家一个老做妈妈来对我说：“履官(是我的小名)，少奶奶(我的母亲)叫偌回去。”我早晓得父亲这几日病势沉重，听了，就把书包拿起，向先生作了一揖回家了。走入父亲房里，在父亲床前对面坐下，只看着父亲。父亲叫我的母亲拿长生果给我吃，我接着就不觉眼中要滚下泪来，正举起手来要向眼上揩，父亲便朝里睡了，大约也不忍看我。这夜子时(十一点多钟)，父亲就撇下了我们母子兄妹四个过世了。

父亲在日，我已没有幸运好好地读书，何况父亲过去了。但是我的母亲呢，偏偏要从他老十个指头底下养活我们的生命，还要叫我承继祖父的“书香”，并且对我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所以请了一位父亲的学生孙先生来教我们兄弟读书，但是也不过和张先生一样。

我十一岁的冬天，母亲给父亲办葬事，父亲的好友汤颐琐先生从苏州来会葬，便带了我回苏州。明年，汤先生就馆到温州去了，却请了一位刘先生

来教我。这位刘先生单名叫题，是苏州阊门外一位医生（自然是中医），所以订明是早来晚归的。他老真会教书，每日早晨九点来钟，我和一个邻舍胡姓的同学到了馆里，他老个别的替我们上新书，温旧书，新旧书都要能够背诵得熟了，再替我们讲解。我虽则懂不得文法，却能了解书上说些什么。他老又叫我们写大字小字。末了是“对课”。这件事情，象是现在的造句子一类的意思，为做文的起码练习。那时做文，都是预备将来考试中秀才举人的，因为那时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诗是要讲对子的，所以从小就要来讲柳眼、桃腮、飞絮、游丝、青云、赤日、乱头风、长脚雨、红板路、白门潮，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五个字能对，成了一韵诗。譬如先生出个“一团蝴蝶梦”，我们对个“几处鹧鸪声”，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

我当时只能对到三个字，但是他老出口，我就对上了。我那位同学天资比不上我，什么都落后，但是他后来也赶上我了。我们在三个钟头里把功课都做完了，他老真喜得要死，每日不到午时（十二点钟），他老便回去行医了。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尤其是我，向来一窍不通，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

可是不幸的事又临到我的头上，不到三个月，

汤先生从温州来信接家眷了，刘先生自然不去，我却跟了姨子（就是汤先生的夫人，是我母亲的盟妹）到温州。汤先生是有名的学者，俞曲园先生的学生，诗文都做得好。他老原想自己教我的，但是他老文酒应酬太忙了，每晚归来，已是“鱼更再鸣”，就没工夫教我了，却叫我读《诗经》、《书经》。我觉得咯哩咯嗒，读都读不上口，哪里还记得上心，了解更谈不上了。但是三五日里，汤先生要我背诵一回，我真叫苦了，因为真是背诵不上几句。这样一年，母亲惦记我了，叫我的叔父来接我回杭州。

我十三岁的正月间（旧历）回到杭州，母亲已替我请好了一位张先生，教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读书。功课是和苏州一样的，但是我依然得不到读书的味道。不到一年，我的家境也决不能够请先生了，就进了一个“宗文义塾”，在“智斋”里从胡诵清先生读书。那时一斋里的学生，程度高的文章满篇，低的还只是背诵对课，我当然在低的方面，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学里的会做诗的学做五言“试帖诗”（试帖诗是应考试用的），自然做不成功，我也觉不得读书的味道。

一年以后，母亲因我的身体不好，叫我回家（原来住在塾里的），在同巷的李伯伯家，从一位萧

山人鲁六僧先生读书。还不是老方子的一贴药，仍旧叫我感不到兴趣，只是写字算越写得好了，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有名的，所以大家也夸奖我。这年是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就是“戊戌政变”的后一年，李家请的鲁先生换了一位范成佐先生。范先生的教书，法子还是一样，可是活泼些，有一回事，却叫我大感兴趣。我有一个姓洪的同学，天资也和我仿佛，我们对背诵，往往要争先到先生面前，我坐得近先生些，当然容易先到，这一回，他乘我不备，早离了他的位子，但是我的眼快，便同时抢到先生面前了，因此他和我都背诵起来。范先生左右为难了，但是他老心里明白，我是后离座位的，他老就出题目了，叫我们都停止背诵，由他老挑出书里一句来，叫我们接着往下背诵。他老先对那位同学说：“你先背。”分明是照顾他的意思。他老就从《论语》里挑出一句：“不占而已矣”，那位同学却背不出。他老又向我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我立刻接上去背诵了。那位同学自然只得捧了书走，气得几乎下泪，我却一面背诵，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学笑。

这时，我对于《论语》《孟子》算能了解他们文法的部分了，就请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咿唔咿唔地读了几篇“程文”（就是模范文），却爱上了俞曲

园先生《课孙草》里“子路宿于石门”一章的一篇，因为有这样四句：“草草杯盘，席上之残肴未撤，荧荧灯火，室中之旧榻犹存。”觉得描写得有趣（这是用王安石的妹子作的诗改作的），就也学做八股文了。可是只做到起股，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

头一年秋季，一夜，明月在天，我从外面回家，遇到有人慌张得很，担了泥菩萨搬家。我很奇怪，听人家说，原来康有为学了外国人，要开学堂，清朝皇帝听了康有为的话，要废佛教，拿天下庙宇来办学堂，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趁夜里这样赶来带菩萨逃难。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一个“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后来的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都是从它改的，现在的浙江大学也设立在它的遗址），我却还没有晓得。

这年夏天，才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养正书塾”，是外国学堂的样子。还晓得我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澄之先生（也是俞曲园先生的学生）在这里面教书，我就向母亲说明了，要进这个书塾，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其实，这种书院、书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二三年到高中的

混合体。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都会做满篇的文章，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了。我呢，入学考试仍就是背诵一回书，因我还不不懂做策论文，把我和同时进去和我一样程度的同学凑了一班，叫做新四班。

我在新四班里和萧山三个姓韩的同学算是一班的“翘楚”，其实不过能做一百来字长的策论。我在半年将完时候，星期做文，一连考上了七次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二个姓韩的同学。不到年终考试，我和两个姓韩的同学便升入老四班了。我在老四班里不过一两个月，国文第一又往往轮到我的头上了，所以这年年终考试的结果，我就升到三班。

我升到三班时候，只有一个算学教员赵望杏先生，是在四班里就教我们算学的，可是我对算学总是格格不入，一部《笔算数学》，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好在那时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目，有的不过是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都无教科书，也是那时还没有编得出来，所以我们读的历史，是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我对地理简直无从入门。英文呢，我对发音来得不准，而且很蔑视外国文，所以英文教员魏冲叔先生用尽方